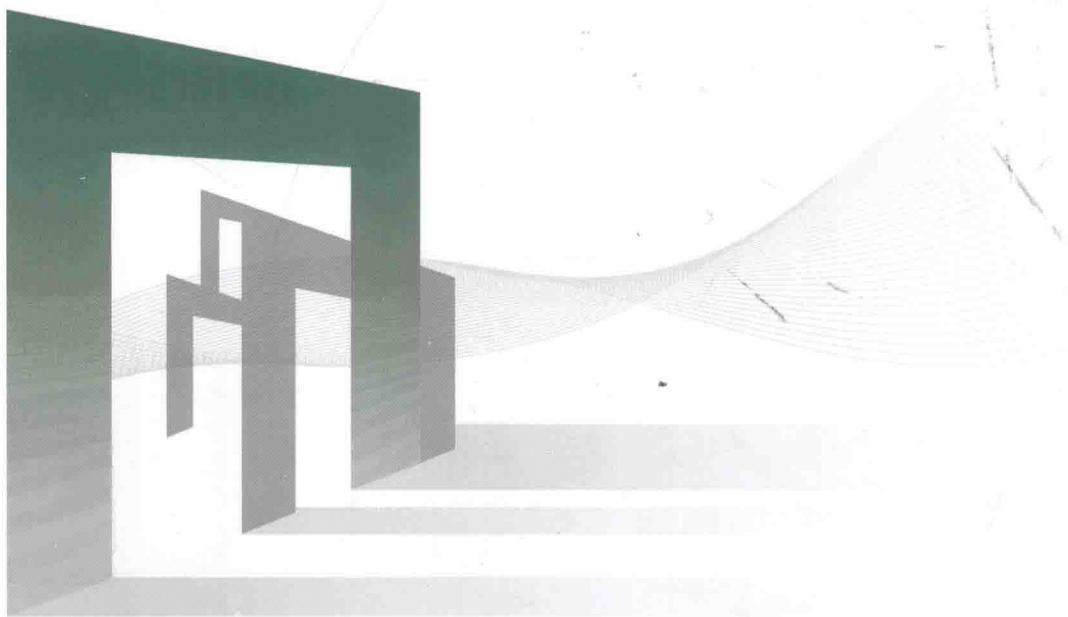


强制性城市化的实践逻辑： 贝村调查

Practical Logic of Institutionaliz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Bei Village

何艳玲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中山大学公共行政学丛书

强制性城市化的实践逻辑：贝村调查

Practical Logic of Institutionaliz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Bei Village

何艳玲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强制性城市化的实践逻辑：贝村调查/何艳玲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0

(中山大学公共行政学丛书)

ISBN 978 - 7 - 5117 - 1812 - 9

I. ①强…

II. ①何…

III. ①农村 - 城市化 - 研究 - 广州市

IV. ①F299.27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9573 号

强制性城市化的实践逻辑：贝村调查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瑛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0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58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何笛贤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特殊而普遍的问题：村庄的“被终结”	1
一、研究的问题	2
二、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8
三、基本框架	14
第二章 村庄的过去：城市化进程中的封闭社区	15
一、村庄概况：封闭而有序	15
二、村庄政治	20
三、村庄经济	21
四、村庄社会	24
本章小结	37
第三章 “终结”的开始：突飞猛进的征地运动与村庄的分化	39
一、大学城项目突然开始	39
二、村庄与村庄外的利益冲突	48
三、村庄内部的震荡	72
本章小结	85

第四章 重建中的村庄：城市？村庄？还是都不是？	90
一、村庄中崛起的“市场经济”	90
二、村庄政治秩序的重建	102
三、村庄更新	120
四、没有边界的社区：外来人口的进入	135
五、他们眼中村庄的未来	140
本章小结	149
第五章 无法终结的结论：强制性城市化与村庄终结的逻辑	154
一、强制性城市化因何发生？怎样实现？	155
二、强制性城市化的结果	165
三、对强制性城市化的反思	170
后记	173

第一章 一个特殊而普遍的问题：村庄的“被终结”

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

——米尔斯（C. W. Mills）：《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行为习惯里，甚至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和制度里。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本书以夏都大学城^①建设过程中难逃“被征地”、“被拆迁”命运的一个村庄为研究对象，意图从微观层面描述村庄终结的前世今生：再现历史，它是自然发展下的田园牧歌；面对现实，它有强制变迁下的底层挣扎；展望未来，它在多方博弈下前途未卜。村庄的“被终结”深嵌于强制性城市化中，探讨中国语境下强制性城市化过程及其逻辑显然极其重要。

^① 本书主要地名、人名都作了化名处理。夏都大学城位于夏都市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其于2003年开始建设，旨在通过一流大学园区的建设，打造教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城市新区。

一、研究的问题

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描述村庄被终结的真实实践，探究强制性城市化的理论缘由，是本书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同时，尽管道德关怀对研究者而言往往是最浅薄的动机，但却是最本真的激励！

（一）村庄是怎样终结的？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中首先提出“村落的终结”。在此书中，“村落的终结”是“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作者在书中指出，“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①

综观《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全书，与其说“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定义，不如说它是作者描述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作者笔下的村落 在传统与现代巨变中的喜怒哀乐，正如作者所说，“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②此书以流畅的行文对“村落的终结”的描绘无疑是深刻的。但是，李培林的研究抱负很大程度上是对“普遍解释力”的追求。一方面，对于“普遍解释力”的追求使得该书将理论的阐述放在比较高的位置（尽管附录了“村庄的故事”），但对于村庄终结“过程”所应有的详细刻画则显得不足；另一方面，就定性研究而言，普适性永远是“处于建构中”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为我们总结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

^①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②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页。

理想类型。^①但是，在不断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总有一些新的事物在持续产生，在现实中也有村庄与羊城村存在差异。

与羊城村比较，本书所研究的贝村具有更大的封闭性。在羊城村那里，村庄“与城市几乎没有了什么边界”^②，是被城市包围的村庄。贝村则仍然相对远离都市，置身于一个小岛，它自给自足，充满着土地崇拜的热情，“倒逼机制”^③没有或者正在形成，现代工商精神依旧欠缺。

当然，这样的村庄同样具有和羊城村相同的特征：村庄内部建筑密度高，建筑间距小，“握手楼”、“一线天”同样可见。道路无良好规划，道路窄，尽管四通八达，但是交错盘结，相对杂乱。再者，由于村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使得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卫生条件差，治安问题突出。此外，还普遍存在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村民擅自违法搭建等现象。

贝村位于夏都市夏都大学城旁边，在官方文件中通常被称为“保留村”。在夏都大学城旁边，有四个这样的保留村。这些村落具有很多共性，我们重点选择贝村作为研究对象。以贝村为代表的保留村是夏都大学城建设的直接产物，而夏都大学城建设则可以置于夏都市乃至其所在的南方省城市化进程中去考察。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学城成为不少中国城市的政府议程。夏都大学城是在南方省经济发展以及“建设教育强省”的政策话语下由政府主动构建的高校园区。而贝村这样的村庄，是在政府强势推进大学城建设背景下，以征地拆迁为手段形成的，是政府“有意识地对大学城所在的小谷围岛原有历史文化建筑予以充分保

^①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论科学理论》，第 181 页，转引自 [法] 让·卡泽纳：《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9 页。“通过特别地突出一种或者几种观点，通过把孤立出现的分散而零碎的现象连成一体，即通过既已择定的有所侧重的观点对时而数量巨大、时而数量微小，时而随处可见，时而又踪迹全无的现象进行整理，继而形成一幅匀称和谐的思维图案，这样，人们就获得了理想类型。”

^②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35 页。

^③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6 页。作者认为，土地稀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逼迫农民到土地之外寻求生路。

护”^① 和民间“村民反抗强烈，阻力太大”的双重话语下的产物。

在大学城征地与建设之前，贝村是封闭而又有秩序的。这种封闭体现在“地域”以及“经济特征”上——村庄处于一个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小岛上，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村庄由于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个体、家庭以及村庄与村庄的互动始终延续着“乡土中国”的特色。然而，这种封闭而有序的生活格局很快被城市化的“宏大叙事”给打破了。

可以说，这些村庄并非因城市化的自然演进而产生，村民们也不是自发走向身份的终结。实际上，在夏都大学城的启动到深入开展乃至于最终完成，村庄始终受到内生和外生力量的夹击。村庄内生力量来自于传统、地域。正如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所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在村庄走向终结的过程中，传统的、地域的内生力量始终构成一个抵制性因素而存在。另一方面，村庄外生力量则是一种推动村庄走向终结的促进性力量。而这种促进性力量则是更加现代的、超地域性的。在研究“村庄是如何终结的”的过程中，我们将村庄看作是“受到内生、外生力量双重夹击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的网络系统”。

我们尝试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村庄终结过程中，强制性城市化的实践逻辑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以下概念进行界定。

首先，什么是“强制性城市化”？这个概念源自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文献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个概念已经有清晰的界定。林毅夫认为，“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② 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定义则更加具体。他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

① 见 <http://www.gzwh.gov.cn/indexnews/whxw/20051215102219.htm>。

②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美〕R. 科斯、〔美〕A. 阿尔钦、〔美〕D. 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4 页。

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① 制度变迁存在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② 本书所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经由单方强力推动，旨在实现其选择的、附带一定成本的个体行为规则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定义中，制度变迁的行动单元可以是民众和政府，“强力”的对立面是“自愿”。在民众与政府、强力与自愿之间，我们可以划分出四种变迁类型（见图1）。在贝村案例中，村庄的终结是政府方面施加的强力，即是政府的政策强加（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它直接导致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旦走向极端即是民众对政府施加强力——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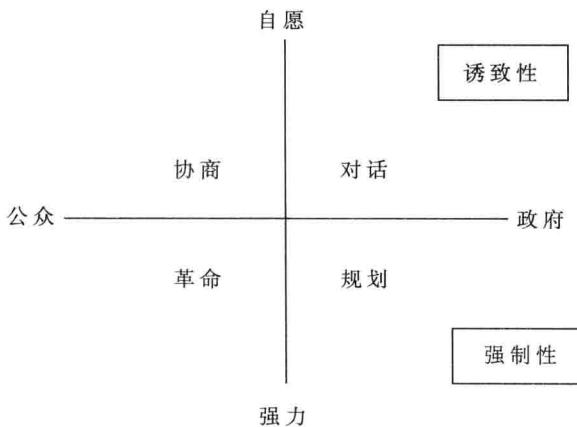


图1 制度变迁类型图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

^②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美]R. 科斯、[美]A. 阿尔钦、[美]D. 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此图给了我们一个思考政府面对民众时候的行为选择模型。在政府启动的强制性城市化之下，博弈的双方——政府与民众，是如何进行互动的，这也就是本书所说的“实践逻辑”。更具体地说，“实践逻辑”包含这样一些问题：强制性城市化——因何产生？如何可能？缘何演进？有何结果？而在这之中，我们将研究各种力量及其行为方式。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始终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强制性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因此，本书也将侧重于对“过程”的描述。而就贝村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将用大量的笔墨让读者敝视村庄的过去与现在。

李培林曾经这样感叹：“在这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这村落的终结点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的裂变和新生的艰难？”^① 带着他的感慨，我们认为，像贝村这种类型的村庄，它们可能没有一个值得展望的未来。也就是说，本书将描绘的是一个中国现实存在的村庄如何“消逝”的过程。

（二）研究背后的道德归依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任何进行调查研究的人首先要面对来自研究终极目的的拷问和反省。

对于研究者而言，一项研究的目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个人目的、实用目的、科学目的（Maxwell, 1996: 15 - 16）^②。毫无疑问，本书所进行的研究这几种目的都存有，而且，其中个人目的最为重要。陈向明认为：如果一项研究主要为了个人的目的，研究的质量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倾向的影响。^③ 当然，如果能够妥善地运用这种“个人的目的”，无疑会对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而随着本书讨论的深入，我们相信，读者会发现并赞成我们的主观目的与倾向。

对于贝村的研究是基于夏都大学城建设工程的兴起与推进而展开

^①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② 转引自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③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的。作为一项世纪伟业^①的夏都大学城，仅其规划蓝图就足够振奋人心：

以 300 亿铸就国内一流大学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塑造高品位的艺术景观环境，营造充满活力和魅力的高等教育场所和优异的成长空间，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典范的总体目标，并定位为珠三角地区乃至华南地区的高级人才培育中心、科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创新中心与产业化基地，夏都市地区的科教核心和中央智力区。^②

按照规划，夏都大学城规划范围 43.3 平方公里，其中可建设用地面积 30.4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35.4 万人，其中在校大学生 18.2 万人，教师员工 4.57 万人。最初预计 2003 年 7 月开始建设，2005 年全部工程建成完工，总投资 320 亿元，其建设目标为：一流规划、一流设计、一流质量，建设全国一流的大学城。2003 年 3 月，当新任省委书记来到南方省之后，夏都大学城建设提前迅速展开；到 2004 年 9 月，经过 19 个月的奋战，大学城一期工程提前完工。2004 年 9 月，首届学生进驻夏都大学城。

在最初的印象中，对于这片土地的过去，我们是比较少留意的。贝村，这个位于我们所在 S 大学隔壁的村庄一直处于被“妖魔化”的状态。一些网络言论将村庄描绘为聚集着大批外地务工人员（一般称为农民工）的场所，而这些农民工在许多人的眼中，正是大学城不安宁的原因所在。在长期的邻里相处过程中，我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去这一村落，也慢慢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脚下曾经是“夏都市最后一片净土”，而学校下面则是一个村庄的灰烬。

“一个村庄的灰烬”——这种表达使其他许多和我们一样的人不免

^① 见 <http://jianshe.enping.gov.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44>。

^② 见 <http://jjc.gzhu.edu.cn/04dxcjs/xgxz-2/xgxz1.htm>。

产生强烈的不安感。在这种不安之下，寻求解脱理所当然。在我们孜孜于寻求解脱并进一步思考和这片土地的关联的时候，我们得出了这样两点结论：第一，不应对这片土地有所辜负，此即成为我们开展研究的动力；第二，作为研究者，这片土地未来的出路我们有责任去关注，这成为选择研究主题的一个道德理由。

当个人主观动机和愿景有了道德的基础，研究无疑受益匪浅。而当现实背后有了道德归依之后，接下来的事就如《新约》所说：“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二、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个案选择

夏都大学城所在的小谷围岛有 6 个行政村、11 个自然村，而在大学城建设的规划中，又有 4 个保留村。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贝村作为研究的对象呢？原因有三：

首先，贝村在官方文本中是被如此描述的：在大学城拆迁过程中党员干部党性强，做了许多工作。^① 而且，村民表现出的对于大学城的“理解与支持”相对其他村庄要高。^② 这无疑给我们以触动、以吸引。

其次，在我们开始关注这个村庄的时候，它正因为村干部挪用 4000 万征地补偿款^③一事而闹得沸沸扬扬。也是因为这个事件，贝村成为夏都市最后一个完成村“两委”选举的村庄。我们直觉，这可能也是村庄基层治理和村民选举一个可供研习的案例。

最后，出于研究便利的考虑。虽然大学城其他保留村都是可供研究的案例，但是由于贝村比邻我们所在的大学，调查更加方便。我们能够长时间保持对村庄的观察，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很有

① 见 <http://www.pyrb.cn/pybold/allnews.php?filename=20030401a01>。

② 见 <http://www.panyu.gov.cn/upload/resource/content/tongzhi.jsp?contentId=17642>。

③ 见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65992>。由于此事在村庄变迁中的重要性，本书后面将不时提及。

帮助的。

从作为夏都市“绿肺”的小谷围岛的一个村庄，到如今被部分村民称为“贫民窟”的保留村，贝村的剧变呈现出几个特点：（1）变化的强制性；（2）变化的瞬时性；（3）变化的不彻底性。在我们开始对其进行全面调查时，尽管村庄的人、事、组织、关系以及传统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由于其不彻底性，变化依旧在不断进行。在进入村庄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一，特殊城市化过程中村庄的基层组织。包括：（1）基层组织如何在政府与村民之间起协调作用？据了解，村“两委”与居民存在较大矛盾，这与上一届村“两委”在政府强行征地与拆迁中的角色有一定关联。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村庄变迁中，基层组织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完成转变？它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协调工作？它如何处理好和村民的关系？（2）沿着基层组织如何处理好与村民关系这个问题，宗族在贝村的地位是值得思考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以及大学城征地拆迁的破坏之后，贝村宗族的重要符号——“祠堂”很多已破落不堪，而在商业与工业慢慢进入农村的时候，宗族的权力也被明显淡化。但是，淡化了影响的宗族是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基层组织的协调功能呢？

第二，村民的传统观念对于村庄城市化过程应该是存在一定影响的。但是，具体是哪一些传统观念造成了影响呢？我们发现，租住当地村民房屋的外来人员（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商业意识很强，能够很容易抓住村庄城市化过程中的商业契机。而与此同时，村民却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往往由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而对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机遇缺乏必要的敏感。这至少造成了以下几个问题：（1）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如何去与现代城市的商业和工业化衔接，对于传统赋予他们的精神或者说信仰，又应该如何去选择、保留或者摒弃？（2）由于他们自给自足的习惯，以及对于现代社会要求的知识、技能的缺乏，他们在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过程中就面临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如何走出传统农业社会所赋予他们的思维方式并立足于第二与第三产业中？

第三，关于外来人口与村民。由于部分村民迁出和外来人口进入，他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化层面的矛盾与利益的纠葛。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探索如下问题：在处理这种矛盾与纠葛的过程中，基层组织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或者说，基层组织在功能与职责上是否应该进行必要的转变？我们在此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庄这样一个“熟人区域”被外来人口的进入与本地人口的退出打破了，那么，是否城市化过程总是一个打破“熟人社会”这个大家庭进而重建“生人社会”小家庭的过程呢？这个过程会不会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出现更多的“邻里淡漠”现象呢？

最后，贝村与夏都市其他城中村是有区别的。贝村处在大学之间，而夏都市大部分城中村是处于商业与工业区之间的，这可能是贝村以及大学城其他保留村的一个特色，这种村庄并不像夏都市区的城中村那样有浓厚的商业味道，而这种商业氛围的相对淡薄对于村庄的发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上述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强制性城市化的实践过程及其逻辑。

（二）研究方法

在案例研究中，追求一种“普遍解释力”并没有太大意义，用某个具体个案的结论来演绎其他个案的因果关系，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个案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而研究所要做的就是，“以地方性、异质性、日常生活的文本、局部知识以及解读、阐释、描写等来取代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①

但是，无论如何，微观个案本身是具有一定演绎功用的。而本书对于贝村变迁的研究，可以称为“延伸个案”（extended – case）的研究方法。延伸个案方法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菲律宾的“Ifugao”部落进行社会观察时使用的一种将社会关系或社会情景考虑

^① 转引自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参见〔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7页。

在内的断案方式。^① 延伸个案方法又称为情景方法，它关注的是个案发生的“情景”，这种情景往往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对于个案的讨论以及结论至少适用于夏都大学城建设所涉及的几个保留村。而我们的意图是，以贝村研究作为一个可供延伸的个案，来更好地把握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村庄变迁的差异性。

在研究定位的基础上，我们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是“过程—事件分析”。“过程—事件分析”经由对事件的动态发展的关注来理解生活文本所隐藏的内涵。

“过程—事件分析”“关注带有事件的过程，特别是那些有开头、有结尾、有情节的事件的过程”。^② 通过这些事件的过程，我们可以把握个体、群体、组织乃至社会之间互动的细节，进而更好地去理解互动。这种方法可能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如下帮助^③：

第一，有一些关键因素在结构上具有一种不可见性，它们只有在过程、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

第二，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在动态实践过程中寻找其推进逻辑。

第三，运用这种研究策略，可以克服“国家中心论”和“本土性模式”的对立。

第四，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解决研究单位选择的问题。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对“过程”进行一个时间的粗略界定。

本研究以“大学城建设前后”作为过程时间界定，关注的是大学城建设前后的村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我们关注村庄“大事”，如村庄选举等集体性事件，也关心村庄的“小事”。

^① 朱晓阳：《“延伸个案”与一个农民社区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卷。

^②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见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09/345.html>。

^③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见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09/345.html>。